



东方历史学术文库

清代科举家族

张
杰
◇
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



东方历史学术文库

清代科举家族

张 杰/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著 者 / 张 杰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

邮政编码 / 100005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sdph.com.cn>

责任部门 / 编辑出版中心

(010)65232637

项目经理 / 宋月华

责任编辑 / 光 知

责任校对 / 秦成康

责任印制 / 同 非

总 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

(010)65139961 65139963

经 销 / 各地书店

读者服务 / 客户服务中心

(010)65285539

法律顾问 /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排 版 /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

印 刷 /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 / 11.5

字 数 / 266 千字

版 次 /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80190-011-1/K·006

定 价 / 24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
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 学术评审委员会

主任委员 戴 逸
副主任委员 齐世荣 金冲及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邓小南 王思治 刘桂生 刘家和
阮芳纪(常务) 陈铁健 张振鹍
张椿年 经君健 郭松义 阎步克
谢曙光

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 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沈志华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丁一川 于 沛 王小甫
张 彤 李世安 李丹慧
杨 群 陈东林 徐思彦

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书目

1994 年度

- 《魏忠贤专权研究》，苗棣著
- 《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》，高王凌著
- 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》，朱德新著
- 《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》，王中田著
- 《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》，沈志华著
- 《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》，李世安著

1995 年度

- 《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》，吴霓著
- 《官府、幕友与书生——“绍兴师爷”研究》，郭润涛著
- 《1895~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》，陈争平著
- 《1949~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》，董志凯主编
- 《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》，马龙闪著
- 《利玛窦与中国》，林金水著
- 《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（1774~1911 年）》，吕昭义著

1996 年度

- 《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》，许檀著
- 《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》，吴吉远著
- 《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》，罗检秋著
- 《南通现代化：1895~1938》，常宗虎著

《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》，左玉河著

1997 年度

《〈尚书〉周初八诰研究》，杜勇著

《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——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》，
侯旭东著

《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》，陈爽著

《西域和卓家族研究》，刘正寅 魏良弢著

《清代赋税政策研究（1644～1840年）》，何平著

《边界与民族——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哈台、满、
汉五件文书研究》，何星亮著

《中东和谈史（1913～1995年）》，徐向群 宫少朋主编

1998 年度

《古典书学浅探》，郑晓华著

《辽金农业地理》，韩茂莉著

《元代书院研究》，徐梓著

《明清高利贷资本》，刘秋根著

《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》，尚小明著

《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——倭仁研究》，李细珠著

1999 年度

《唐代翰林学士》，毛蕾著

《唐宋茶业经济》，孙洪升著

《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》，臧运祜著

《改良的命运——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》，邵丽英著

2000 年度

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》，印群著

《中国地名学史考论》，华林甫著

《宋代海外贸易》，黄纯艳著

- 《元代史学思想研究》，周少川著
- 《清代前期海防：思想与制度》，王宏斌著
- 《清代私盐问题研究》，张小也著
- 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》，王跃生著
- 《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——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》，徐浩著
- 《农民、市场与社会变迁——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》，侯建新著
- 《儒学近代之境——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》，张昭军著
- 《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：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》，潘光 王健著
- 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（1861～1917）》，戴桂菊著
- 《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（1941～1947 年）》，李春放著

2001 年度

- 《〈仪礼·丧服〉考论》，丁鼎著
- 《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》，韩树峰著
- 《两宋货币史》，汪圣铎著
- 《明代充军研究》，吴艳红著
- 《明代史学的历程》，钱茂伟著
- 《清代科举家族》，张杰著
- 《清代台湾的海防》，许毓良著
- 《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》，〔韩〕曹世铉著

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 改版弁言

从 1998 年起，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设立文库的初衷，“出版前言”都讲了，这是历史记录，改版后仍保留，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，而且要不断改进，做得更好。

1994 年，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，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，文库得以顺利面世，迄 1997 年，已出版专著 25 部。1998 年，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，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 7 部。5 年草创，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，应征书稿逐年增多，质量总体在提高，读者面日益扩大，听到了肯定的声音，这些得来不易，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；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，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、不足和遗憾，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。

如何改进？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，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。

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，资助出版的专著，无例外要由专家推荐、经编委初审、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，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；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，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，主张“宁肯少些，但要好些”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

一套好书。这些证明，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。从客观来说，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；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在提高，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。总之，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。

出精品，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。如“出版前言”所指出的，开辟研究的新领域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、提出新的学术见解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，都是好书。当然，取法乎上，希望“上不封顶”；自然，也要合格有“底”，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、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，是合格的“底”。有了好书稿、合格的书稿，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，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，以公平竞争为准则。最后，还要精心做好编辑、校对、设计、印装等每一道工序，不然也会功亏一篑。

5 周岁，在文库成长路上，还只是起步阶段，前面的路还长，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。

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编辑委员会

1998 年 9 月

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

出版前言

在当前改革大潮中，我国经济发展迅猛，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，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，全国热气腾腾，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，举国公认，世界瞩目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，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“利之所在，虽千仞之山，无所不止；深渊之下，无所不入”的浊流。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，不受影响，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，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，由于印数少，赔本多，则寥若晨星。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，往往求出书而无门，感受尤深。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，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。

历史科学的责任，是研究过去，总结经验，探索规律，指导现实。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，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，与此关系匪浅。中国是东方大国，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，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，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，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。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，有鉴于此，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，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。创业伊始，主要是切磋研究。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，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

设立“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”，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。凡入选的著作，均以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作为丛书的总名。

我们这一举措，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，中青年同行的关注。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，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，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；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，投赐稿件。来稿不乏佳作——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；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；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；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，皆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百花齐放，绚丽多彩。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，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。

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。凡提出申请的著作，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，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，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，投票通过。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，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，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，这是一大遗憾，也是我们歉疚的。

大厦之成，非一木能擎。史学的繁荣，出版的困难，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。我们此举，意在抛砖引玉，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，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；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，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。

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》编辑委员会

1994年9月

戴逸先生序

家族组织最早出现于中国原始公社末期，随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出现而形成。自夏朝以后，家族组织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。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特点是家国一体，政权和族权紧密相结合，而以西周的分封制度最为典型。战国以后，家族组织继续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而长期存在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，官僚制度取代了夏商周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。然而在东汉后期，又出现世家大族控制政权的政治局面。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，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政治体制。宋元明清时期，科举出身的官员，成为封建政权庞大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。科举制度确立之后，家族组织与之相适应，设族田、立族学、定族规，积极鼓励族人读书应考，由此在中国各地形成了不少世代应举、科名不断的家族。

张杰同志撰写《清代科举家族》一书，以《清代硃卷集成》所载 8000 多份硃卷为基本史料，选取新的研究视角，创造性地提出“科学家族”这一概念，并将其界定为“在清朝世代聚族而居，从事举业人数众多，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，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”。这一概念，是根据中国家族组织形态的演变，以及科举制度创立与发展，尤其是明清历史时期特点抽象出来的，它在说明清朝历史的进程中，具有更强烈的时代

特征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，科举取士，在门第、军功、荐举之外，开辟了以知识选拔人才的途径，而且成为最重要的途径。科举家族是明清时期新兴的官绅地主代表，它使行政官员与乡间绅士这两种身份合二而一，从而构成清代封建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。科举家族将财富、学识、权力与名望结合在一起，在清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。张杰同志对科举家族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研究，正如有的专家指出，“是利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一部代表作”。

历史学获得每一次重大发展进步，都与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密切相关。甲骨文、敦煌文书的发现与明清档案的利用，对 20 世纪历史学产生的推动作用，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但是时下史学界学风空疏浮躁，难见肯坐冷板凳发掘新材料撰写的佳著出版问世。近年来有关科举的著作，曾经在学术界盛极一时，出版了不少专著。潘光旦、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《科举与社会流动》一文，频繁地被各种相关著作所引用，而他们据以得出结论的硃卷材料则无人光顾。《清代硃卷集成》一书自 1992 年问世以来，还未见有人充分利用这套史料。张杰同志穷十年之功，从数千份试卷履历中，选取有典型意义的科举家族进行系统研究，包括经济基础、人文环境、日常生活、社会流动、地域变化、家族影响多个视角，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。

张杰同志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之前，是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，著名清史专家孙文良的弟子，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。他具有坚实的研究基础和独立思考能力。后来他报考我的博士生，录取以后，因临时改变工作计划，是年我不带清前期的研究生，转由郭成康教授指导。他勤奋努力，好学深思。我们相识已久，他经常来我处谈论学习和研究中的问题。他与郭成康教授反复商议，决定以《清代硃卷集成》为研究对象，立即得到我的全力赞同。我很希望像他这样有研究条件的学

者能花较长时间致力于利用《清代硃卷集成》这一尚未被开发的珍贵史料。此项研究必能产生优秀的学术果实。由于他在以前即对这套史料较为熟悉，撰写论文的思路和方法基本妥善，故在论文答辩时，获得专家的一致好评。我作为答辩委员会的主席，与其他委员一样，对他的博士论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会后便建议他尽可能完善这篇论文，争取写成一部好的学术专著来。张杰同志果然不负众望，当我拿到他的书稿，阅读完毕，深感这是一部极富学术创新的力作，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。

首先，详细论证经济条件在科举家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。

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，是否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？这个问题长期被科举制度表面上的公平性所掩盖。该书通过对力田起家的地主、逐什一之利的商贾、军功起家的将领和长期为宦的官员等四类家族的全面分析，论证了经济条件在应考中的决定性作用。如书中曾提到的两个典型例子：一是河南虞城县人耿济瀛，家贫以教书为业，他之所以能考取进士，靠的是他遇到了几位业师的多方帮助，提供给他“笔墨之资”，减免他的学费；另一个是江苏南通人张謇，其家族世以农为业，他的父亲为张謇兄弟聘请塾师，“脩金视他儿逾倍，邱先生倚之，虑謇兄弟他适”。张謇后来能考中状元，与塾师邱先生在高额报酬驱动下，为他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有很大关系。科举家族前辈族人，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支持后代踊跃应举。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，经济基础是文化教育的前提。没有前人奠定的物质财富，后人就没有条件安心读书。一些贫苦农家子弟，不仅没有条件读书应考，生活艰难，连卷纸钱都拿不出来，更何谈三场童试所需的10两白银与上京应试的巨额盘缠，他们想连年持续参加考试是不可能的。科举家族的世代应考，必须具备相当雄厚的物质财富才能成行。

其次，将科举家族兴旺发达的原因归结于重视文化教育。

在封建社会中，皇亲国戚，富商巨贾，文官武将，田连阡陌的大地主，家资丰厚者比比皆是。为什么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，有的家族很快转变为“世以儒业进”的科举家族，而有的家族却长期与科举无缘？作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，与家族成员所生活的人文环境，特别是与对以科举为导向的应试教育重视有关。科举家族中的长辈教育族人，刻苦读书不断获取功名，是科举家族代代相承的“世业”。富有财产的族人，通过设立族田兴办族学，为贫寒族人免除衣食之忧，以保持家族在科举中的优势地位。科举家族的先人，还亲自课读族中子弟，向他们传授科场考试经验。科举家族在男婚女嫁上，重视的是双方家族文化水准，儿子结亲访查妻家道德风尚，女儿择婿考虑夫家的文化素养。这样做的结果使子孙后代在科举应试中保持了优势，保证了家族在科举上的长盛不衰。

第三，客观评价科举家族在地方教育中的贡献。

作者将殊卷履历与地方文献有机结合，列举了科举家族成员在教育上鲜为人知的事迹。在所列举的每个家族中，从事私人讲学的既有生员、五贡，也有举人、进士，他们不论功名高低、官位大小，连续几代数十人辛勤耕耘，为地方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。科举家族有许多成员出任州县教官，他们教学有方，谢绝学生礼物。无论是自己在家中收徒讲学者，还是充当府州县学教官的科举家族族人，都用他们辛勤的汗水，直接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人才。科举家族还有不少族人出任地方官员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，与地方官相配合，热心倡建书院、义学，踊跃赞助开办经费，努力发展地方文化教育，作者将科举家族的贡献归纳为：充分发挥全体族人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，善于运用手中权力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，巧妙利用社会声望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，处处体现榜样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等方面。

第四，填补满族科举家族研究的空白。

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，而目前研究清代科举和家族史的众多论著，几乎很少或根本未能涉及满族，实在是很大的缺陷。该书引用了相当多的满、蒙旗人试卷履历，使我们增加了科举在满族人入仕中的重要性认识。尤其是在科举家族地域分布及其变化一章，重点分析了以满族为主的八旗科举家族的崛起。清朝以武功取天下，满族出身的清朝皇帝从皇太极时起，就力图维系以“国语骑射”为特征的满族旧俗与尚武之风。而清政权入关和康熙统一台湾之后，随着内地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与维持统治的需要，满族人开始与汉族人一样使用汉字参加科举考试。由于清朝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，保证旗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条件，从优确定八旗子弟录取人数，出现了八旗子弟踊跃应试的局面。清朝皇帝在任用八旗官员时，也越来越重视科举出身人员。雍正帝倚任的大学士鄂尔泰，乾隆帝重用的大学士阿桂，皆为举人出身，且都位居首席军机大臣。嘉庆帝时的军机大臣那彦成，道光帝时的英和、穆彰阿，则皆为进士出身。在北京满族人中间，以能成为科举家族为荣。

第五，充分肯定科举家族的历史地位。

由于清代任用官员，首重“科甲出身”，使科举家族成为清政权中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。清政权的汉族主要官员，基本上来自著名的科举家族。清朝统一的完成，以及清朝统治在全中国的确立，除了八旗官兵骁勇善战之外，更主要的是依靠科举家族出任各级政府官员，在清朝统治区建立起有效的统治。满族出身的清朝皇帝，出于维持其统治的需要，自入关之日起，就开始努力学习汉族封建文化。他们的老师，多出自著名科举家族成员。清代重要执政大臣和地方督抚，大都出于著名的科举家族。山东福山王氏族人王检，在湖北巡抚任上朝觐乾隆帝，乾隆帝在询问王检家世后说：“女（汝）父子三人，俱入翰林，一门多显官，

能办事，可谓世臣矣。”乾隆帝用“多显官，能办事”和“世臣”这八个字，高度概括了科举家族对康乾盛世的形成，以及他们在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。由此作者推论：清代从中央到地方政权的庞大官僚队伍，主要集中在几百个著名科举家族之中。这个论断，大致是符合清代历史进程的。

《清代科举家族》是一部拓荒性的学术著作，因为基本上无前人成果可供借鉴，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是正常的。如该书为了深入阐述科举家族情况，引用了多种方志、家谱、笔记，史料间配合得较好，但能够说明清代科举家族的史料，包括正史、文集、笔记，还有很多，可惜限于时间、篇幅，作者未能更多利用。又如，科举家族的负面影响，书中虽然在结语中也做了若干分析，指出：科举家族与皇权形成了极为密切的互相依存关系，从而成为清朝统治的支柱与附庸；科举家族成员一般不仅不参加生产劳动，而且也不关心社会生产，把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在考场上。若能够展开史料，结合清末废科举的背景，相信会更有说服力的。

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，辽宁大学的清史研究，在国内外曾有相当的影响。张杰同志博士学位取得后，回到辽宁大学工作。我预祝他能够在清史研究上继续努力，取得新的成就。

2002年1月